

“乡—城”人口迁移对城镇 劳动工资的影响研究*

刘昌平 花亚州

【摘要】文章测算了中国“乡—城”人口迁移对城镇平均劳动工资造成的影响,并基于劳动力异质性假定,运用固定替代弹性函数分别对城镇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及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对城镇各类劳动者收入水平都存在负效应,其中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和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受到的冲击最大,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仅有小幅度的下滑,由此助长了不同劳动群体的收入差距,而提高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可作为缓解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基于此,文章认为中国应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战略,为社会资本在乡镇投资创造条件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从而在发挥迁移人口劳动力价值的同时避免对城镇劳动工资造成负效应;此外,还需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劳动力 “乡—城”人口迁移 工资 弹性

【作者】刘昌平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花亚州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总是与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相伴相随。近年来,市场经济模式在解放人们传统思维的同时,也撬动了户籍管理制度等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障碍,流动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在这一时期迅速壮大,形成巨大的“乡—城”人口迁移浪潮。根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75亿,全年流动人口达2.47亿^①,年度迁移率为17.97%;同期,中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金财政支出规模与影响因素分析”(编号:71273198)的阶段性成果。

① 流动人口,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国农民工规模达到 2.77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 亿,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 41.57%^①。

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已成为中国近些年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引擎,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得以维持,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王德文,2007);同时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明显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城乡收入差距(蔡昉,2010)。当然,这是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乡—城”人口迁移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微观来看,倘若“经济蛋糕”做大的速度无法赶上利益分享者数量增加的速度,对原本就处于利益分享者队伍中的个体而言,其分配结果是否会由于新人的加入而发生改变?^②具体到本文,即规模庞大的“乡—城”迁移人口从农村涌入城镇,是否会对城镇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工资造成影响?进一步,若考虑到中国迁移人口的劳动技能普遍偏低(谢桂华,2012),如果把城镇本地劳动力根据劳动技能更加细致地划分成不同层次,那么各层次劳动群体的工资水平将受到何种影响?

国内关于“乡—城”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大多关注“人口红利”效应。例如,对城镇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对储蓄、投资、经济发展等带来的积极影响;部分学者探讨了人口迁移给城镇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竞争和挤出效应(赵耀辉等,2007);沈坤荣、余吉祥(2011)基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回归模型发现农村移民给城镇居民收入带来了正效应。此外,再鲜有针对城镇本地劳动工资所受影响的分析。西方国家虽然不存在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但不乏一些学者从国际移民的角度,分析跨国人口迁移对迁入国劳动工资水平的影响。结合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看,外来移民的加入确实会给迁入国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包括“拥挤效应^③”、就业紧张等问题,继而拉低本地劳动力的收入水平(Bratsberg 等,2012; Borgas, 2013; Ruist 等, 2013)。当然,这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分析。实际上,根据劳动力异质性理论,由于不同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存在差异,他们在面对来自其他劳动者的竞争时所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与新加入劳动者的技能越接近,替代效应就越明显,就业和工资受到的冲击就越大。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根据劳动技能的差异,对不同层次劳动力进行分类讨论,结果显示,由于跨国移民的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在迁入国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劳动(Borjas 等, 1991),因此,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受到的冲击最大,移民的到来不仅导致他们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Edo, 2015),其收入水平也明显下滑(Altonji 等, 2002);而高技能劳动力一般不会受到移民的冲击,不仅如此,其收入水平甚至会小幅上升(Kemnitz, 2003);至于退休人员,在实施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跨国移民的加入将增加养老金制度的供款人数,并提高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水平(Kemnitz, 2003)。但必须指出,由于不同学者的建模过程和

① 2015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为 4.04 亿。

② 尽管平均收益水平下降,但由于“经济蛋糕”并非均等分配,故不同个体的损益情况无法一概而论。

③ 移民对迁入地各种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的使用造成的拥挤效应,在广义上也被认为是本地人口的“损失”。

研究方法存在差异,迁移人口对本地劳动工资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例如,Scholten 等(1996)的理论模型证明,跨国移民反而能够给迁入国平均劳动工资带来小幅度的提升,尤其在拥有完备的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该趋势会更加明显;Dustmann 等(2013)对英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考虑跨国移民的长期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也可能不降反增(Ottaviano 等,2008),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也可能不增反降;甚至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跨国人口迁移无法对迁入国劳动工资水平的变化做出解释(Mannacorda 等,2012)。

殷宝明、刘昌平(2014)分析了“乡—城”人口迁移对中国城镇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造成的影响,认为年龄结构较年轻的迁移人口能够缓解制度支付压力,为制度可持续性带来“养老金红利”。这在西方国家也有据可循,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通过吸纳劳动年龄段的跨国移民来降低本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从而缓解日益上升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已逐渐成为共识(Gal,2008)。但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考虑了迁移人口对城镇年龄结构的积极影响,事实上除人口结构外,缴费工资作为影响制度平衡的重要参数之一,也会受到“乡—城”人口迁移的影响。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看,该影响的方向和强度如何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国内学者虽然从整体上分析了移民对城镇劳动工资带来的影响,但并未进一步结合劳动力异质性,更细致地考察不同劳动群体所受影响的方向及幅度,而这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大规模“乡—城”人口迁移,分析城镇各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究竟会降低还是提高?幅度有多大?以此作为进一步测算中国“养老金红利”规模的重要参考。

二、假设前提与模型构建

(一) 假设前提

1. 劳动力异质性

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个人面临两种决策:要么投入 $e(0 < e < 1)$ 单位的劳动时间^①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作为高技能劳动力在剩下的劳动期间进行生产,每单位时间提供 1 单位的有效劳动(表示为 EL);要么直接进入劳动市场,并在整个劳动期间保持低技能,每单位时间提供 $\mu(0 < \mu < 1)$ 单位的有效劳动。假定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报酬为 w ,则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可分别表示为 $w \times (1-e) \times 1$ 和 $w \times 1 \times \mu$ 。不难发现,存在一个均衡状态下的 e^* ,使上述两种决策无差异,即:

$$w \times (1-e^*) = w \times \mu \quad (1)$$

整理得到:

$$\mu = 1 - e^* \quad (2)$$

显然,当 $e < e^*$ 时, $w(1-e) > \mu w$,理性的劳动者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获得高技能;当 $e > e^*$ 时, $w(1-e) < \mu w$,劳动者将放弃人力资本投资,保持低技能。为简便分析,设 e 在 $(0,1)$ 之间

^① 将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标准化为 1。

均匀分布,则 e 的分布函数为 $F(e)=e(0<e<1)$ 。假定城镇本地劳动力总量为 U ,则城镇高、低技能劳动力可分别表示 $U_h=U \times F(e^*)=U \times e^*$ 和 $U_l=U \times [1-F(e^*)]=U \times (1-e^*)$ 。

由于在城镇就业的农村迁移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多从事于低技能行业,故本文假定“乡—城”迁移人口 M_l 全部为低技能劳动力^①,迁移率可表示为:

$$m=\frac{M_l}{U}=\frac{M_l}{U_h+U_l} \quad (3)$$

2. 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替代弹性固定

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函数形式,一般形式为 $Y=AK^\xi L^{1-\xi}$, A 、 K 、 L 分别代表技术、资本和劳动。但必须指出,C-D函数无法表示要素替代弹性不等于1情况下的生产问题,此时则需要退回到更一般的固定替代弹性(CES)函数^②,其基本形式为 $Y=A[\xi K^\rho+(1-\xi)L^\rho]^{\frac{1}{\rho}}$,其中参数 ρ 衡量了两种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通过简单的数学推导可证明,C-D函数是CES函数在 $\rho \rightarrow 0$ 情况下的特殊形式^③(此时替代弹性趋于1)。而在劳动力异质性假定基础上,显然没有理由能够判定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替代弹性为1,因此,生产函数中的不同类型劳动要素投入不能直接采用C-D函数形式,必须引入CES函数。

3. 劳动力市场均衡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和数量由其供需曲线的交点决定,在该点上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要素成本相等。本文假定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在此条件下,劳动者每投入1单位的有效劳动均能够得到相应的劳动工资作为补偿,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可通过计算生产函数对有效劳动的偏导得到,即: $w=\partial Y/\partial EL$ 。

(二) 模型构建

1. “乡—城”人口迁移对整体工资水平的影响

在 t 年,城镇劳动力总量 L_t 由城镇高技能劳动力 $U_{h,t}$ 、城镇低技能劳动力 $U_{l,t}$ 和“乡—城”迁移低技能劳动力 $M_{l,t}$ 3部分构成。结合劳动力异质性假定,则 t 期的有效劳动总量可表示为:

$$EL_t=U_{h,t}+\mu_l U_{l,t}+\mu_l M_{l,t} \quad (4)$$

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① 谢桂华(2012)对迁移人口劳动技能的实证研究可作为该假定的依据。

② 固定替代弹性函数(CES函数)由Arrow等人于1961年在“*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一文中提出。

③ 当 $\rho \rightarrow 0$ 时,令 $u=\xi K^\rho+(1-\xi)L^\rho$, $v=\frac{1}{\rho}$,则: $\lim_{\rho \rightarrow 0} \frac{Y}{A}=\lim_{\rho \rightarrow 0} e^{v \ln u}=\lim_{\rho \rightarrow 0} e^{\frac{\ln[\xi K^\rho+(1-\xi)L^\rho]}{\rho}}$,通过洛必达法则求 $\frac{0}{0}$ 型极限,得: $\lim_{\rho \rightarrow 0} \frac{Y}{A}=e^{\lim_{\rho \rightarrow 0} \frac{\xi K^\rho \ln K+(1-\xi)L^\rho \ln L}{\xi K^\rho+(1-\xi)L^\rho}}=K^\xi L^{1-\xi}$,故: $Y=AK^\xi L^{1-\xi}$ 。

$$Y_t = A (K_t^\beta R_t^{1-\beta})^\gamma EL_t^{1-\gamma} \quad (5)$$

其中, Y_t 为总产出; A 为技术进步率; K_t 和 R_t 分别表示资本存量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 根据 2005 年世界银行的测算, 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1, 故 K_t 和 R_t 可以直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①; β 、 γ 共同决定 K_t 、 R_t 和 EL_t 所占的份额。至此, 单位有效劳动的报酬可表示为:

$$w_t = \frac{\partial Y_t}{\partial EL_t} = A (1-\gamma) (K_t^\beta R_t^{1-\beta})^\gamma EL_t^{-\gamma} \quad (6)$$

综合式(4)和式(6)可计算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迁移率弹性 E_{w_t, m_t} ^②, 整理得到:

$$E_{w_t, m_t} = \frac{\partial \ln w_t}{\partial \ln m_t} = -\gamma \frac{1}{e_t^* + \mu_t (1-e_t^*) + \mu_t m_t} \cdot \mu_t m_t \quad (7)$$

2. “乡—城”人口迁移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

由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并非完全替代, 要具体分析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受到的影响,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显然无法反映真实的劳动投入情况, 因此引入一般意义下的固定替代弹性(CES)劳动函数:

$$EL = \left[\sum_i \alpha_i l_i^\rho \right]^{1/\rho} \quad (8)$$

其中, i 表示劳动力所属类型, 包括高技能 h 和低技能 l ; α_i 表示第 i 类劳动力的单位有效劳动生产率份额, 故 $\alpha_h = \frac{1}{1+\mu}$, $\alpha_l = \frac{\mu}{1+\mu}$; l_i 表示第 i 类劳动力的数量; ρ 决定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不变的替代弹性 σ , 公式为: $\sigma = \frac{1}{1-\rho}$ ^③。由此, 式(5)表示的生产函数变为:

$$Y_t = A (K_t^\beta R_t^{1-\beta})^\gamma \left[\sum_i \alpha_{i,t} l_{i,t}^\rho \right]^{1/\rho} \quad (9)$$

① 关于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之间替代弹性的测算见“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World Bank, 2005)。

② 通过计算弹性系数指标, 能够直观地反映迁移率对工资水平造成的影响方向及幅度。

③ 设 CES 劳动函数为 $L = \left[\sum_i \alpha_i l_i^\rho \right]^{1/\rho}$, 取对数得到: $\ln L = \frac{1}{\rho} \ln \left(\sum_i \alpha_i l_i^\rho \right)$ 。设 $f = \ln \left(\sum_i \alpha_i l_i^\rho \right)$, 则劳动替代

$$\begin{aligned} \text{率为: } MRS_{hl} &= \frac{\partial f / \partial l_h}{\partial f / \partial l_l} = \frac{\alpha_h}{\alpha_l} \left(\frac{l_h}{l_l} \right)^{\rho-1}。由此, 替代弹性为: \sigma = - \frac{d \ln \frac{l_h}{l_l}}{d \ln \frac{\partial f / \partial l_h}{\partial f / \partial l_l}} = - \frac{d \ln \frac{l_h}{l_l}}{d \ln \frac{\alpha_h}{\alpha_l} \left(\frac{l_h}{l_l} \right)^{\rho-1}} = \\ &= - \frac{d \ln \frac{l_h}{l_l}}{d \ln \frac{\alpha_h}{\alpha_l} + d \ln \left(\frac{l_h}{l_l} \right)^{\rho-1}} = - \frac{d \ln \frac{l_h}{l_l}}{(\rho-1) d \ln \left(\frac{l_h}{l_l} \right)} = \frac{1}{1-\rho}。 \end{aligned}$$

根据 $l_{i,t}$ 的定义可知: $l_{h,t}=U_{h,t}$, $l_{l,t}=U_{l,t}+M_{l,t}$ 。由式(9)可以计算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继而可分别得到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迁移率弹性 $E_{w_{h,t},m_t}$ 和 $E_{w_{l,t},m_t}$,整理得到:

$$E_{w_{h,t},m_t}=\frac{\partial \ln w_{h,t}}{\partial \ln m_t}=\alpha_{l,t}(1-\rho_t-\gamma)m_t\frac{(1-e_t^*+m_t)^{\rho_t-1}}{(1+m_t)^{\rho_t}} \quad (10)$$

$$E_{w_{l,t},m_t}=\frac{\partial \ln w_{l,t}}{\partial \ln m_t}=\alpha_{l,t}(1-\rho_t-\gamma)m_t\frac{(1-e_t^*+m_t)^{\rho_t-1}}{(1+m_t)^{\rho_t}}-(1-\rho_t)\frac{m_t}{1-e_t^*+m_t} \quad (11)$$

本文进一步考察“乡—城”人口迁移情况对城镇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定义二者的相对工资为 z_t ,则根据式(9)有:

$$z_t=\frac{w_{h,t}}{w_{l,t}}=\frac{1}{1-e_t^*}\left(\frac{e_t^*}{1-e_t^*+m_t}\right)^{-\frac{1}{\sigma_t}} \quad (12)$$

由此可整理得到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迁移率弹性 E_{z_t,m_t} 为:

$$E_{z_t,m_t}=\frac{\partial \ln z_t}{\partial \ln m_t}=\frac{1}{\sigma_t}\times\frac{m_t}{1-e_t^*+m_t} \quad (13)$$

考虑到受教育程度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式(12)基础上考察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受教育程度弹性,即:

$$E_{z_t,e_t^*}=\frac{\partial \ln z_t}{\partial \ln e_t^*}=\frac{e_t^*}{1-e_t^*}-\frac{1}{\sigma_t}\times\frac{1+m_t}{1-e_t^*+m_t} \quad (14)$$

三、参数设定与模型测算

(一) 数据来源和参数设定

1. 城镇就业人数和外出农民工人数

本文所用城镇就业人数 U_t 来自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对于“乡—城”迁移人口 $M_{l,t}$,本文不考虑流动人员中未就业部分及本地就业部分,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的外出农民工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历年迁移率如表1所示。

表1 2002~2015年城镇就业人员及外出农民工总数

年份	城镇就业人员 总数(万人)	外出农民工 总数(万人)	迁移率 (%)	年份	城镇就业人员 总数(万人)	外出农民工 总数(万人)	迁移率 (%)
2002	24780	10470	42.25	2009	31120	14533	46.70
2003	25639	11390	44.42	2010	34687	15335	44.21
2004	26476	11823	44.66	2011	35914	15863	44.17
2005	27331	12578	46.02	2012	37102	16336	44.03
2006	28310	13181	46.56	2013	38240	16610	43.44
2007	29350	12600	42.93	2014	39310	16821	42.80
2008	30210	14041	46.48	2015	40410	16884	41.78

注:根据2002~2014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

2.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本文根据城镇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计算劳动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并计算其与总劳动年限的比值,即得到 e^* (见表 2)。

表 2 2003~2013 年城镇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年份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平均受教育年限	e_i^*
2003	2.6	12.6	39.7	27.4	12.2	5.2	0.3	10.458	0.2324
2004	2.0	12.1	41.3	26.3	12.4	5.5	0.3	10.520	0.2338
2005	3.2	17.0	43.3	21.1	9.8	5.1	0.4	9.909	0.2202
2006	2.8	16.9	43.3	21.2	9.9	5.3	0.6	10.001	0.2222
2007	2.5	16.2	44.8	21.1	9.8	5.1	0.5	10.015	0.2226
2008	2.4	16.3	45.2	20.8	9.5	5.3	0.5	10.005	0.2223
2009	2.1	15.4	45.6	20.7	9.9	5.8	0.5	10.119	0.2249
2010	1.2	12.4	44.1	21.9	11.7	7.8	0.8	10.613	0.2358
2011	0.8	9.9	39.3	24.9	14.4	9.9	0.9	11.178	0.2484
2012	0.8	9.5	39.6	24.8	14.4	9.9	0.9	11.169	0.2482
2013	0.9	9.5	39.0	24.1	15.0	10.4	1.0	11.226	0.2495

注:数据来自 2004~2014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e_i^* 为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总劳动年限(劳动年龄取 15~59 岁)的比值。需指出,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人口迁移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这里不再细分城镇本地劳动力与迁移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模型假定 1 已经对此进行了说明。

3. 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整体上还没有按照收入法统计的国民收入构成,因此本文对历年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中的劳动者报酬进行加总^①,继而求得整体的劳动份额(见图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4、2008和2013年的数据缺失,本文借助 *Matlab* 软件进行3次样条插值^②,得到上述年份的劳动份额分别为0.4330、0.4338和0.4616。算出劳动份额后, γ 值随即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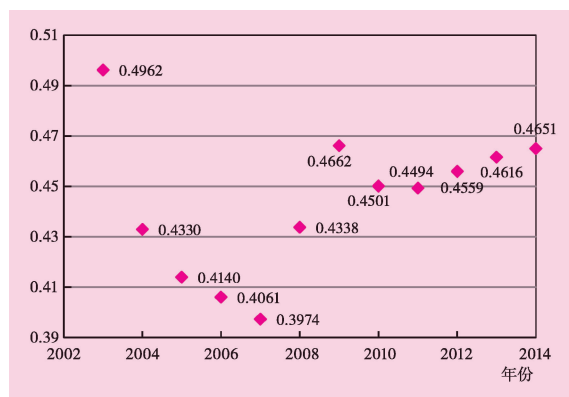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14 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4. 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

关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替代弹性的测算,Katz 等(1992)提出的方法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和沿用(Ottaviano 等,2008)。本文同样借鉴该方法对中国的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 σ_i 进行测算,即:

① 数据来自 2004~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 在一维插值中,与其他方法相比,3 次样条插值的光滑度明显好于其他插值方法。

$$\ln\left(\frac{w_{h,t}}{w_{l,t}}\right)=\ln\left(\frac{\alpha_{h,t}}{\alpha_{l,t}}\right)-\frac{1}{\sigma_t}\ln\left(\frac{T_{h,t}}{T_{l,t}}\right)+\varepsilon_t \tag{15}$$

其中, $w_{h,t}/w_{l,t}$ 为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之比; $\alpha_{h,t}/\alpha_{l,t}$ 为相对劳动生产率; $T_{h,t}/T_{l,t}$ 为高、低技能劳动力投入的总劳动时间之比; ε_t 为随机误差项。

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 本文根据 2014 年中国各行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进行排序^①, 从中分别选取 5 个高劳动技能代表行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 教育; 金融业;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 5 个低劳动技能代表行业农、林、牧、渔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结合前文分析及式(2)可知, 相对劳动生产率 $\alpha_{h,t}/\alpha_{l,t}$ 可表达为关于 e_t^* 的函数, 各行业历年的就业人数、平均工资和平均劳动时间数据均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由此即可

求得各年份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国家统计局自 2012 年起开始采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导致个别行业统计口径发生改变, 考虑到更改后的样本数量较少, 本文采用 2011 年及以前的统计口径和数据^②。从图 2 可以发现, 近年来, 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始终保持在 [1.73, 2.48] 区间范围内, 平均值为 2.07, 高于 Katz 等(1992)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测算结果 1.41, 同样略高于 Ottaviano 等测算的替代弹性区间 [1.52, 1.92]。但总体上依然符合国外学者计算的合理区间(Ottaviano 等, 2008), 因此, 可以认为本文关于替代弹性的测算是可靠的。

(二) 测算结果

城镇各类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迁移率弹性测算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 3 可以发现, 无论是基于城镇就业人员整体, 还是根据劳动技能划分的各层次群体, 其工资水平的“乡—城”人口迁移率弹性均为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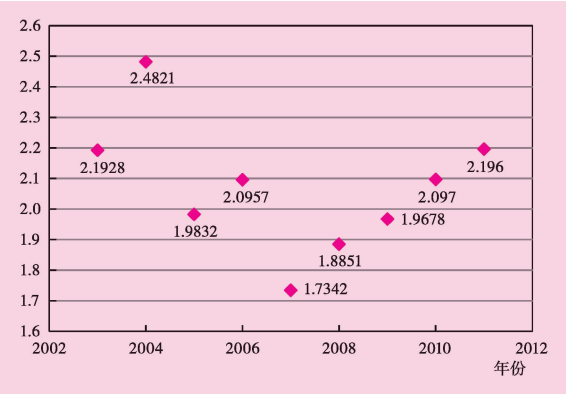


图 2 2003~2011 年代表性行业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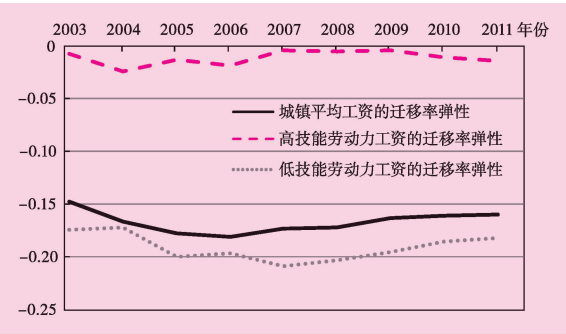


图 3 2003~2011 年各类型劳动力的迁移率弹性

① 各行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参考 2014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实际上, 历年统计年鉴显示的高、低劳动技能代表性行业是相当稳定的。
② 行业统计口径对本文拟说明的问题并无实质影响。

且该弹性在过去 10 年来始终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其中,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对“乡—城”人口迁移的反应最为敏感,迁移率每增加 1%将导致其工资水平下降约 0.19%;而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迁移率的变化极不敏感,每增加 1%的迁移率仅造成大约 0.01%的工资下降;而对于退休人员(纯粹的养老金领取者)而言,其基础养老金直接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该部分养老金收入对迁移率的变化也较为敏感,每增加 1%的迁移率导致基础养老金水平下降约 0.17%。

基于图 3 所示的各类劳动力迁移率弹性,结合每年的实际人口迁移率,可以计算历年来“乡—城”人口迁移对城镇不同群体收入水平造成的影响(见表 3)。整体来看,城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受到的影响非常小,降幅最低的年份只有 0.16%(2007 年),降幅最高的也不过 1.05%(2004 年),平均降幅仅为 0.49%;相比之下,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和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受到的冲击较大,平均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8.61%和 7.53%,尤其对前者而言,个别年份其工资水平受到的负效应甚至高达 9.48%(2008 年)。此外,“乡—城”人口迁移对不同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平均能够解释城镇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 14.85%。

最后,对式(14)的计算结果表明,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较为明显。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可以使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缩小约 0.28%。整体而言,本研究结论与国际经验基本吻合,不同之处在于,多数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往往随着低技能移民的加入而提高,尽管幅度并不明显,而本文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受到轻微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能的解释在于中国整体而言教育水平还不够高,即便是当前所谓的城镇“高技能”劳动群体,也无法完全避开劳动市场上农村转移人口带来的冲击。

表 3 2003~2011 年“乡—城”人口迁移对城镇各类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 %

年份	对城镇平均工资的影响	对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对相对工资的影响
2003	-6.56	-0.31	-7.73	13.29
2004	-7.45	-1.05	-7.68	11.86
2005	-8.15	-0.56	-9.18	16.25
2006	-8.42	-0.82	-9.14	15.75
2007	-7.44	-0.16	-8.97	15.75
2008	-8.00	-0.25	-9.48	17.44
2009	-7.60	-0.18	-9.10	16.83
2010	-7.09	-0.47	-8.19	13.67
2011	-7.05	-0.60	-8.05	12.77
平均	-7.53	-0.49	-8.61	14.85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和本文模型计算得到。整体平均工资受到的影响与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受到的影响是一致的。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乡—城”迁移人口为中国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显著年轻化的人口

结构对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城镇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言,能够为养老基金平衡贡献可观的养老金红利。但在测算该红利的规模时必须注意,农村转移人口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改善城镇地区人口结构的同时,也给各类劳动者工资水平带来不同程度的负效应。农林牧渔业、住宿及餐饮业等劳动技能较低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每年因人口迁移而遭受的工资降幅接近9%;科学研究、教育、金融等劳动技能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工资下降幅度不到0.5%;由于退休人员的基础养老金直接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其受到的负效应同样显著,达到7.5%。因此,人口迁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镇不同类型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当然,提高劳动力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可以作为缓解收入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一个直观的想法就是“如何才能够在避免人口迁移对城镇各类劳动者收入水平带来负效应的同时,充分发挥农村转移人口的劳动力价值?如何缓解中国各类群体的收入差距?”基于这一思想,本文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 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社会资本投资与自主创业

从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需求等角度来看,城镇化无疑是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之一。但与此同时,房价增长过快、基础设施不足、资源短缺、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也愈发凸显。尤其对数以亿计的“乡—城”迁移人口而言,他们久居城市却始终难以融入,无法同本地人口一样享受同等的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权利,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考虑到当前中国异地城镇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及其种种弊端的存在,就地城镇化作为一种新的模式选择,可以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推进就地城镇化能够有效避免“乡—城”迁移人口给城镇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带来负效应,对收入水平本就不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和退休人员影响更大。但就地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地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和财富,否则就地城镇化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反而是对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为社会资本投资于乡镇创造条件。可以预见,就地城镇化应是中国将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而能否吸引社会资本在乡镇地区投资办厂是就地城镇化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必须承认,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目前乡镇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显然难以吸引有资质的企业和社会资本流入。因此,走就地城镇化道路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职能发挥。中央政府应在宏观层面为资本进入农村和小城镇开辟绿色通道,特别在土地划拨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地方政府在认真履行中央各项优惠措施的基础上,应以更加开放和负责的态度为资本流入创造条件,有条件的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债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力争形成当地的产业基础,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第二,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培养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拓宽创业渠道,是农民自主创

业成功的关键,这些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首先,要为农民提供一个便利、平等的创业环境,包括简化审批手续、打击乱收费、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激发农民的创业信心和热情;其次,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宣传典型等方式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农民的资金能力,地方政府应联合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增加小额贷款的规模,真正解决农民创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此外,需要拓宽农民的创业思路,不必局限在农林牧渔等传统行业,诸如旅游、住宿、餐饮、食品加工等同样可以作为理想的选择。总之,城镇化发展必须突破过去笼统的人口空间转移,而要真正实现人口的产业转移。

(二) 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

收入差距过大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确实提高了个人收入,但本文对城镇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能够解释城镇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大约 15%。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镇低技能劳动力,其就业和工资不得不面对“乡—城”迁移人口的巨大冲击,可见教育在帮助劳动者应对劳动力市场竞争时的重要作用。

当然,比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更亟须关注的是城乡差距。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优质的教育资源聚集在城市,造成农村人口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技能的培养和眼界及思维的开拓等方面与城镇劳动力存在巨大差距,这不仅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择业范围,更直接影响了其收入水平。因此,配合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大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力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现实困境,避免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劳动收入能力的长期影响。对于那些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必须切实解决好随迁子女就地入学问题。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文根据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划分高技能行业与低技能行业,但事实上各行业均涵盖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仅对行业进行划分难免存在误差。研究人口迁移对不同学历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也可以作为一种考虑,当然,尽管学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劳动力技能,但毕竟不是唯一标准,如何准确地衡量劳动水平值得更深入的探讨。其次,本文引用世界银行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论,认为资本与土地等自然资源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完全替代关系,尽管这一论断可以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但中国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2. 沈坤荣、余吉祥(2011):《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第3期。
3. 王德文(2007):《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4. 谢桂华(2012):《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5. 殷宝明、刘昌平(2014):《养老金红利:理论与来自中国的实证》,《中国软科学》,第10期。
6. 赵耀辉、刘学军(2007):《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基本态势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课题报告》。
7. Altonji J.G., Card D.(2002),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Less-Skilled Natives.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Economics*. 151:184-217.
8. Arrow K.J., Chenery H.B., Minhas B.S., Solow R.M.(1961),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3(3):225-250.
9. Borgas G.J.(2013), The Analytics of the Wage Effect of Immigration. *IZA Journal of Migration*. 2(22):1-25.
10. Borjas G.J., Trejos S.J.(1991), Immigrant Participation in the Welfare System.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4(2), 195-211.
11. Bratsberg B., Raaum O.(2012), Immigration and Wages: Evidence From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22(565):1177-1205.
12. Dustmann C., Frattini T., Preston I.P.(2013),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Along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1):145-173.
13. Edo A.(2015),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Native Wages and Employment.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15(3):1151-1196.
14. Gal Z.(2008),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elping to Solv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geing. *Sociologia*. 40(1):35-61.
15. Kemnitz A.(2003), Im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Pension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1):31-48.
16. Katz L.F., Murphy K.M.(1992),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1):35-78.
17. Mannacorda M., Manning A., Wadsworth J.(2012),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Wages: Th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ritai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1):120-151.
18. Ottaviano G.I.P., Peri G.(2008),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Wages: Clarifying the Theory and the Empir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14188.
19. Ruist J., Bigsten A.(2013), Wage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The World Economy*. 36(1):31-47.
20. Scholeten U., Thum M.(1996), Public Pens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a Democracy. *Public Choice*. 87(3-4):347-361.
21. World Bank(2005), 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asuring 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责任编辑:朱 犁)